

诸葛亮研究文集

一九九八年

諸葛亮研究文集

一九九八年

目 录

反复皴染 逐渐成像——谈《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出场描写艺术	1
诸葛亮考察刘备	3
诸葛亮草庐故居地望综观	7
襄阳、南阳诸葛亮在何处躬耕	14
用人管人应学诸葛亮	17
从兵出祁山与兵出子午看诸葛亮的得与失	18
虽识时务而未明大义——诸葛亮形象再认识	21
诸葛亮教育思想浅探	26
“诸葛亮择妻”的朝鲜版本	29
揲谈诸葛亮的勤政和廉政	30
诸葛亮与街亭之役——读《三国演义》札记之三	31
简论诸葛亮的精神风范	35
由诸葛亮遗产想到的	37
论诸葛亮之用人和魏延之悲剧	38
全国第十次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综述	43
烘托法在诸葛亮形象塑造中的运用	45
只因一着错 决策半成空——论诸葛亮对荆州失守的责任	48
论诸葛亮的封建法治	51
诸葛亮的管理理论与实践散论	57
诸葛亮家世考略	62
慎以处事 谦以纳言——诸葛亮“谨慎”性格小议	67
诸葛亮北伐失败的评价	70
诸葛亮与管理——从一副对联说开去	73
余明侠《诸葛亮评传》读后	76
古代八阵渊流及诸葛亮八阵考略	79
“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虚写”在诸葛亮出场前的运用	86
诸葛亮偏爱马谡	88

关于诸葛亮的复姓及世家探源	89
周恩来与诸葛亮人格魅力之比较	93
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范型及其文化意蕴	96
诸葛亮与汉末法治思想的渊源关系	102
试论诸葛亮的忠君爱国思想	105
诸葛亮的《又诫子书》是写给谁的	111
新编“隆中对”	114
探析传统三顾茅庐论诸葛亮自荐	115
诸葛亮的立志思想及其意义	119
管仲、诸葛亮、刘基的经济思想	124
用人管人不妨学学诸葛亮	126
诸葛亮的自我推销	128

反复皴染 逐渐成像

——谈《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出场描写艺术

王志民

《三国演义》人物的出场，形式各别，变化多样。有作者作伐，欲歌而叙者，如刘备；有先声夺人，自报家门者，如张飞、关羽；有赤膊上阵，忽然而至者，如曹操、孙坚等。而诸葛亮的出场不同于以上诸人，作者运用了一种反复皴染、逐渐成像的方法来描写，取得了独到的艺术效果。

所谓“皴染”，就是逐渐上色的意思，是国画表现笔墨层次的一种技法，在文学创作中被用来比喻多层次描写的方法。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回时说：

……其演说荣府一篇者，盖因族人多，若从作者笔下——叙出，尽一二回不能得明，则成何文字？故借冷子兴一人，略出其文，使阅者心中，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然后用黛玉、宝钗等两三次皴染，则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也。（脂砚斋评批《红楼梦》第24页，齐鲁书社，1994年第1版）

这里所说的“画家三染”，就是反复皴染的意思。脂砚斋认为，荣国府的人物出场，不宜也不能全由作者站在全能全知的角度——叙出，而应该采用反复皴染的方法，即分别以冷子兴、林黛玉、薛宝钗的视点为视点，各依其所闻所见来描写，使描写对象由远到近、由虚到实、由淡到浓，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把诸葛亮的出场分作三层来描写，即三次皴染：

第一染乃是“玄德南漳逢隐逸”，刘备马跃檀溪，遇到水镜先生司马徽。言谈之中，司马徽指出刘备至今功业未就的原因，在于“左右不得其人”。刘备因问“奇才安在，果系何人？”司马徽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问“伏龙、凤雏何人也？”司马徽却抚掌大笑，只说“好！好！”不予回答。晚间，刘备因思司马徽之言，寝不成寐。忽听一人叩门而入，与司马徽谈及“欲投明主”等语，刘备暗想此人必是伏龙、凤雏，欲出见，又恐造次。候至天亮，求问来者是谁，司马徽又是笑而不答。这是第一染。

第二染乃是“元直走马荐诸葛”与“司马徽再荐名士”。徐庶化名“单福”辅佐刘备。曹操因母，徐庶遂别刘备赴许昌，因向刘备推荐一位奇士：“此人乃琅琊阳都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名珪，字子贡，为泰山郡丞，早卒，亮从其叔玄。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为《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先生。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宜早往驾见之。若得此人肯相辅

佐，何愁天下不定乎？”并指出“伏龙正是孔明”。徐庶走后，司马徽来访，并谈及诸葛亮：“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大略，抱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关羽在一旁说：“某闻管仲、乐毅乃春秋战国名人，功盖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司马徽说：“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关羽问：“那二人？”司马徽说：“可比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众皆愕然。这是第二染。

第三染乃是“刘玄德三顾草庐”。刘备一访孔明不遇，却路遇崔州平，得闻一番“治乱之论”；二访孔明也不遇，却得见孔明之友孟公威、石广元、弟诸葛均、岳父黄承彦。听其作歌吟诗，刘备皆以为是孔明，然而都不是；三访得遇，“定三分隆中决策”，诸葛亮正式出场。这是第三染。

这三次皴染写得极有层次。第一染，司马徽半隐半露地说出“伏龙”二字，继而，半夜里的神秘来客又引起刘备对“伏龙、凤雏”的遐想。“至于‘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墙闻环佩声，并半面亦不得见”。第二染，徐庶因感刘备“爱贤之笃”而推荐了孔明，向刘备也向读者介绍了诸葛亮的姓名、字号、身世、才能。司马徽怪徐庶多事，以“不荐之荐、不赞之赞”的方式把诸葛亮的交游、志向和才能补充介绍一番，使读者对诸葛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第三染，石、孟所唱之歌，隐透着孔明的抱负志向，均、黄所吟之诗表现了孔明的德操情怀。而三分决策，使刘备顿开茅塞。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未出茅庐，先定三分。诸葛亮以“智绝”的形象，终于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这种描写方法，在小说中取得了独到的艺术效果：一、反复皴染，强化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多有读者表示，《三国演义》到三顾茅庐才精采，而至秋风五丈原之后就暗淡了。换言之，这部书的精华部分全以诸葛亮为始终，何以如此？是因为作者把诸葛亮塑造成了“第一妙人”的缘故。而“第一妙人”形象的塑造，有赖于作者对人物出场的大肆渲染。

二、逐渐成像，层叠悬念，文势起伏。毛宗岗说：“孔明乃《三国志》中第一妙人也。读《三国志》者，必贪看孔明之事。乃阅过三十五回，尚不见孔明出现，令人心痒难熬，及水境说出‘伏龙’二字，偏不道姓名，愈令人心痒难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后，再回身转来，方才说出孔明。读者至此，急于观其与玄德相遇矣。”作者于此次多设置悬念，让刘备以为是孔明，而实非孔

「乌台诗案」起 岂由《双松》诗

周正举

“乌台诗案”是北宋文坛和政坛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字狱，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当然是很有意义的。袁金先、杨隆高先生在其大著《苏轼悬案揭秘》（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以下简称《揭秘》）中辟有《“乌台诗案”之谜》专章，用六万余字来揭“乌台诗案”的“秘”，不可谓不用力。但遗憾的是，“乌台诗案”的“秘”并未“揭”准。

《“乌台诗案”之谜》里有一个小题目，曰：“乌台诗案”是由哪首诗引起的？这题目就是错误的。“乌台诗案”不是由诗引起，而是由文引起的。元丰二年（1079）二月，苏轼移知湖州。他在《潮州谢上表》中说：“臣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陛下知其愚不谄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生事”等语刺痛了投机新法的人，于是“新进”们接二连三地上书弹劾苏轼。先是太子中

允、权监察御史何大正进札，说苏轼《谢上表》中所云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接着，集贤殿校理、权监察御史舒宣进札，首言《谢上表》“有机切时政之言”，次举苏轼《山村绝句》、《戏子由》、《八月十五观潮》等诗，云：“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造物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议盐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迨来三月食无盐’。”三是国子博士李宜进札，称苏轼文

明。“写来如海上仙山，忽近忽远”，文势迭宕起伏。

三、变换视点，解决了叙述线索问题。孔明是《三国演义》的中心人物，对于他身世经历、志向抱负、性格才能的介绍，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诸葛亮的出场是在第三十八回，如果作者还站在全知全能的视角去叙述，书中势必加上一大段“诸葛亮小传”，这成何文字？运用“嵌套”之法，以刘备“访孔明”为线索，通过孔明之亲、之友的特定点进行描写，既脱斯刘备的线，又把孔明迎上了场。

四、采用侧写，一石数鸟。从三十五至三十八回，

《灵壁张氏园亭记》“内有一节，显涉讥讽”。四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李定进札，云“苏轼有可废之罪四”：曰“怙恶”，曰“傲悍”，曰“鼓动流俗”，曰“汕上”。七月二日，奉旨首送御史台报勘。苏轼被正式“立案侦察”了。那些御史们找来苏轼《钱塘集》，就苏轼“为作诗赋并诸般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罪名”，开始深文傅会。苏轼系狱后，“时狱司必欲置之死地，锻炼久之不决，……上亦终怜之，促其狱”（《苏轼年谱》）。十一月二十八日，终于结案，有个招告，南宋时据这个结案闻奏招告并东坡供词整理成《乌台诗案》印行（见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这个结案招告并不难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清梁廷楠《东坡事类》中就收录了《乌台诗案》全文。从《乌台诗案》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乌台诗案”是由《潮州谢上表》一文引起的，而不是由诗引起的；御史们“覈”诗构罪，是由《谢上表》生发而来，终于成为苏轼主要罪状。说“乌台诗案”是由诗引起，盖有望文生义之嫌。《揭秘》作者断定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松二首》二引起了“乌台诗案”。作者写道：

苏轼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其中有一首叫作《王复秀才所居双松二首》，其中之二写道：“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首诗描写了两株松树“凛然相对”，“直干凌空”，根到九泉，亦无曲处的雄姿，至多不过是苏轼借此抒发自己挺拨不屈的性格而已。但他的这首诗却遭到了御史何正臣、舒宣等人的引中曲解，他们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控这首诗表现出苏轼对神宗皇帝的不臣之意。副相王珪就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求之地下之蛰龙，其不臣如此！”宋神宗接受了何正臣、舒宣等人对苏轼的指控后，立即派人到湖州拘捕苏轼，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王复秀才所居双松二首》（以下简称《双松》），是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通判杭州时所作。王复，钱塘人，住杭州候潮门外。苏轼在《钟德亭》诗的《叙》中说：“处士王复，家于钱塘。为人多技能，而器尤精，期于活人而已，不志于利。筑室候潮门外，治园圃，作亭榭，以与贤士大夫游，唯恐不及，然终无所求。人徒知其接花蔬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种者德也”。从苏轼《赠王复秀才》诗自注中，我们还可以得知：王复旧有园亭，苏轼名之曰“钟德”，园内有双松，是隋唐间所植。苏轼写《双松》诗，谓双松的树干是直的，在外表：树根

“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孔明虽未遇一，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飘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静；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得接席百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玄德一访再访，已不觉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顾耶！”孔明被烘托出来了。与此同时，也表现了许多人的精神面貌。其中，表现刘备的求贤若渴之情，更是淋漓尽致。



诸葛亮 考察 刘备

□卫 风

《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草庐一场戏多少年来脍炙人口。刘备求贤若渴，诸葛亮坐而待价，成为尊重人才的典范。不过，三顾茅庐其实是刘备与诸葛亮两位智者相互试探、了解的较量结果，这也许是粗心的读者想不到的。

就《三国演义》的情节安排看，刘备迫切需要一位军师。他手下有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勇将，

两度占领徐州做根据地，有“皇叔”的名分，还一度与袁绍结盟共击曹操，然而却屡遭败绩。等到他退到荆州依附刘表，遇蔡瑁几设杀计，被迫马跃檀溪脱险时，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想绝路逢生，从司马徽那里听到了“伏龙”、“凤雏”的名字，又在徐庶来而复去的过程中，知道争取诸葛亮出山辅政，实际是他匡扶汉室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为此，他在赴隆中邀请诸葛亮前，不能不作充分的准备。这是读者都能想到的方面。

诸葛亮的情况却是读者不易觉察的了。虽然他的门上书一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而且作歌道：“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自碌碌；南阳有隐者，高卧卧不足。”但他却深知如他这样的一名普通士人，如果不想躬耕陇亩一辈子，唯一的出路是去投靠一名统治者，凭自己的智力换一碗饭吃。他自比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乐毅，正是为了引起某个统

治者的注意；他可以清醒地判断形势作隆中对，更说明他对人仕早有准备。不过，以诸葛亮这样的智者而论，他自然会对自己的情况有所分析，他是从袁术那里避居荆州的，对袁绍、袁术这样的四世三公子弟了解甚透，没有名声的青年士人在袁氏兄弟手下肯定不会有前途。诸葛亮或许也考虑过曹操，这位“乱世之奸雄，治国之能臣”倒真是唯才是举，单看他拉拢关羽的行为便可以知道，假如曹操知道了诸葛亮的价值，抢先到了隆中草庐，将也会有一番虔诚的表演了。只是曹操用人如器，只拿人当工具使，并不真正把人看作是“人”。攻打寿春时为了解决兵多粮少的困难，便把仓官王垕的人头“借”过来用；为了把徐庶从刘备那里抢过来，逼得徐庶的母亲上吊自杀。前车之鉴，诸葛亮不能不有所顾忌，何况曹操手下已有荀彧为首的一批人才，诸葛亮去了不过是群僚之一，不但不能人尽其才，还会遇到不可避免的“内耗”之险。曹操那里不能去，孙权是否可以考虑呢？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就在江东供职，去孙权那里兄弟俩可以有所照应。但是孙权用的大多是江东人，如彭城的张昭，吴郡的顾雍、陆绩、凌统、朱桓、张温、陆逊，庐江的周瑜、陈武，会稽的董袭、虞翻、骆统、吕范，临淮的鲁肃，丹阳的朱治、朱然等。诸

葛亮这个山东琅琊人到了那里，肯定施展不开。曹操、孙权两位英雄麾下没有席位，刘表、刘璋等“守户之犬”又是诸葛亮看不上眼的人，所以比较来比较去，正在苦苦挣扎的刘备其实是诸葛亮所投靠的最佳人选。刘备缺兵少将，正在广纳人才；刘备有“皇叔”名分，可以用来号召天下；刘备手下没有军师，诸葛亮正好可以去大显身手；刘备待人宽厚，在他手下较少政治风险。从诸葛亮的角度看，他在隆中等刘备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两位智者见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闲谈，而是聘用与应聘的“谈判”。用人者与求职者都要有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都在考虑怎样才能使谈判取得成功。

刘备采取主动形式是很自然的。他自桃园结义从军以来，已有20多年的政治生涯，参加了在当时算是最重大的几次活动，如十八路诸侯联军讨董卓，讨平吕布、袁术势力，玉带血诏讨曹盟约，袁曹官渡之战等。这样刘备虽无基业，却有名声，他的全部活动已为诸葛亮所了解，或者说只能打明牌了，所以一旦得知诸葛亮的情况，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登门拜访，听完《隆中对》后就可以正式相邀了。对于刘备来说，这次“聘用谈判”能否成功，只在于对诸葛亮个人能力的判断与礼遇。

诸葛亮则要费一番心思了。理想中的明主刘备来了，这可是一生中唯一一次机遇。刘备需要的是一群人，把诸葛亮请出来，如果不中意，还可以再请别人；诸葛亮需要的只有刘备一个人，刘备要是不象别人传说的那样宽厚仁爱，诸葛亮就无异于引火烧身了。更何况诸葛亮熟读经史，深知统治者对士人可用也可弃，士人贡献智力取得成功，至多是升官受赏；士人出主意导致失误，很可能受罚遭祸。自从有史可据，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的君主少而又少，奸诈凶残、刚愎自用的昏王比比皆是。刘备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自己毕生效力的人？诸葛亮并不敢凭道听途说来作出结论，他需要认真作一番考察。于是当徐庶前来告之“玄德即日将来奉谒”时，诸葛亮变脸责备说：“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而且拂袖入内室，把老朋友弄了个羞惭而退。

曹操大军逼近荆州，迫使刘备尽快采取对策，所以三顾茅庐的故事在徐庶赴曹营的同时展开。就在刘备赴隆中之前，最先向刘备透露诸葛亮信息的司马徽不请自到，留下“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的谶语，这其实是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刘备到了隆中卧龙岗，没有见到诸葛亮，问何时归来？童子说：“踪迹不定……归期亦不定。”显然是暂时回避，

算是向刘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以诸葛亮的本意，第一个问题是问刘备想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问刘备将如何对待自己？由于提问方式太特殊，诸葛亮怕刘备理解不了，将这出山人仕的机会失之交臂，于是委托好友崔州平在隆中返新野路上等候刘备。崔州平对刘备说：“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刘备对这话已经心领神会，于是回答说：“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这便是请崔州平转告诸葛亮：我是为匡扶汉室而来请您，能否成功？自然要看天意；但是否去做？却是伸张正义的选择。诸葛亮与刘备的第一次接触，便以这种互不失礼的形式完成了。

刘备在隆冬时节冒雪二顾茅庐，虔诚之心自不待言。诸葛亮偏要让石广元与孟公威在酒店唱歌给刘备听，一个唱：“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另一个唱：“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显然告诉刘备：诸葛亮正处于出山人仕与继续归隐的选择之间。所以刘备到了庄前，能听到诸葛均的歌声：“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既盼望明主赏识，

施展平生抱负；又眷恋自由天地中的孔颜乐处，这是中国士人的共性。刘备是名儒卢植的学生，当然知道士人寻明主而出卖智力的必要性，于是毫不犹豫留下书信，盼望诸葛亮“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对黄承彦所感叹的“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倾刻遍宇宙”心领神会，他自信诸葛亮已经动心，见面已成定局。当然，还要给诸葛亮留几天考虑的时间。

等到刘备三顾茅庐时，双方其实都作好了准备。刘备在离草庐半里之外便下马步行。诸葛亮也派诸葛均前来告诉：“将军今日可与相见。”然后飘然而去。张飞不解，说：“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不妨，何故意自去了？”刘备知道诸葛亮在作最后的试探，忙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正因为有了应付试探的思想准备，面对诸葛亮草堂春睡，刘备才能强拉心高气傲的关羽和性情暴躁的张飞在外面等两个时辰——相当于太阳下站四个小时。

诸葛亮作隆中对，根据刘备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基本的战略方针，显然已经有了为刘备效力的打算。但当刘备提出请诸葛亮出山相助时，诸葛亮偏要说：“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这既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怨恨，也是对失去了个人田园生活的一

种遗憾。不过，这也对刘备提出了最难回答的问题。刘备既不能为诸葛亮提供什么实惠，也不能许诺什么条件，更不敢有所强求，只好拿出两种基本武器。一种武器是“情”，他哭得“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另一种武器是“义”，他对诸葛亮说：“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这个“情”，并非个人之间的私情，而是对汉室即“国家”的宗法血缘性质的伦理情感；这个“义”也非朋友之间交往的信义，而是士人为民请命不惜舍身之义。诸葛亮既然是学儒的士人，自然无法抵抗刘备使用爱国之情与救民之义的轮番进攻。作为智者的诸葛亮终于完成了对刘备的全部考查。作为投身竞争大潮的刘备并没有付出任何实质性代价便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这一场艰苦的“聘用谈判”就这样形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三顾茅庐的直接结果，是刘备取得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效力；诸葛亮获得了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人生价值实现。双方相互试探、了解后终于合作成功，各得其所。

(张 锦摘自《竞争与谋略》)



诸葛亮草庐故居地望综观

刘庞生

(西北大学, 西安 710069, 男, 46岁)

摘 要 文章依据社会背景、史籍记载、历史沿革、行政区划、汉碑石刻、演绎推理、提出悬念、由浅入深, 对诸葛亮草庐故居层层考证, 同时澄清了一些是非观念, 表达了对学术争鸣应持的态度。试图对草庐故居争议的起因、经过、结果, 历史与现实, 有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性的了解。

关键词 故居 南阳郡 邓县 隆中 襄阳 沔水

关于诸葛亮草庐故居(以下称“故居”)在何处的讨论, 是个老话题。读部分学术争鸣文章, 查阅相关资料, 笔者认为: 文章学术价值普遍很高, 但略显分散, 不易从几篇文章里观其全貌; 对少数观点、论证、资料引用, 尚不能完全苟同。面对专家, 不敢班门弄斧。思之再三, 还是草成拙文, 略抒浅见, 一吐为快。

一、历史上早已有争论

1990年3月15日, 谭其骧教授在上海史学界举行的“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座谈会”上说: “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还是襄阳的问题, 有人说是由来已久的问题, 好像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悬案没解决。我认为这是向来没有疑义的问题。”

实际上, 历史疑义是有的。疑义自元代始。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 康孔高撰《南阳府志》录元仁宗皇帝元年(1312年)秋, 程矩夫撰《敕修南阳诸葛亮碑》云: “南阳城西七里, 有岗阜隆然, 隐起, 曰卧龙岗。相传汉朝忠武侯故居, 民岁祀之。”碑文打破了从诸葛亮蜀建兴十二年(234年)死到元碑立的1079年间, 故居在襄阳西的传统的一家之言, 出现疑义。

嗣后, 明、清两朝官修统志, 除载有襄阳故居外, 同时又载南阳故居, 两说并存。如: 《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 就连权威钦定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也同载两说。

清代亦有争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三任南阳知府的襄阳人顾嘉衡, 在南阳武侯祠有副题联:

“心在朝廷, 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 何必辨襄阳南阳。”这是平衡争论的折衷说。

1988年《中州今古》、1989年《集邮》载文重提故居南阳说, 否定襄阳说。《三国演义》系列邮票发行, 也引起争论。不久, 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南阳相继召开关于故居学术研讨会。先后出版两部观点对立的论文集, 各收录争鸣文章40余篇。

看来, 疑义客观存在。有疑义必有争论; 争论未果, 必成悬案。争议焦点是故居究竟在何地?

二、故居在襄阳城西隆中

从建安十二年(207年)冬, 诸葛亮出山前的社会关系入手, 寻其故居。

出山前结交的师长、朋友、姻亲, 分两部分:

一部分为荆州以外籍俊杰。汉献帝刘协兴平(194年)、建安(196年)前后, 到荆州避乱的“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益有千数”(南朝人范晔《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时襄阳县城是荆州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兴平二年(195年), 诸葛亮随叔父玄, 携全家来荆州投奔刘表, “遂寓居襄、邓间”(清人梁章钜《三国旁证》卷二十一)。和诸葛亮成为挚交的州外籍朋友主要有, “颍川石广元、徐元直, 汝南孟公威”(《三国志·诸葛亮传》), “博陵崔州平”(西晋人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他们居住在襄阳城外。北朝北魏人酈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载: “又北经檀溪, 谓檀溪水, ……溪之阳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 悉人居。……”在襄

阳城西一里许。

另一部分是襄阳名士望族。被诸葛亮奉为师长的庞德公,堪称汉末襄阳第一名士,南朝人裴松之注《三国志·庞统传》,引东晋人习凿齿《襄阳记》曰:“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另一位被诸葛亮奉为师长的是号称水镜先生的古文经学家司马德操,裴引《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此间自有卧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亮,庞士元也。’”被称为凤雏的庞统,近与诸葛亮齐名,是诸葛亮好友之一。他们三人都住在襄阳城东,《水经注·沔水》载:“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士元居之阴,在南白沙;司马德操宅洲之阳,……”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姐夫庞统,皆襄阳、中庐名门;小姐是庞德公儿媳;岳母与刘表后妻是同胞姊妹——同为襄阳名宦蔡瑁胞姐,蔡瑁是诸葛亮妻舅,刘表是诸葛亮妻姨父。诸葛亮与襄阳黄、蒯、庞、蔡、刘五家豪门望族联姻,加之和名师高士交往,实际上出山前,他已步入上流社会圈子,成为当地名人。

据《后汉书》、《三国志》、清人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清人谢钟英《三国大事表》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前,刘表虽为荆州牧,但宛城(今南阳市)一带还不能完全控制,先由袁术、张绣、曹操反复争夺,后被曹操占领。期间,刘表仅向宛北两次出兵,一次在“建安六年,刘表攻西鄂(今南阳北石桥)”,“西鄂北杜子绪帅县男女婴城而守”(《古今说部丛书》辑东晋人司马彪《九州春秋》);第二次在建安七年,刘表令刘备攻博望于禁、夏侯惇,人皆共知,因曹势大,两次突袭皆获胜即返,遂又被曹占据。宛城此时不太平,难道诸葛亮会选择宛城避乱、隐居、躬耕吗?他可能不可能身居宛城,而到250里外的襄阳去结交交友?非也,且史载宛城无亲友。

既然宛城不可能隐居躬耕;既然史载宛城无亲友;既然投奔刘表,刘表屯襄阳;既然交往过从甚密的师友亲朋全在襄阳居住;故居哪里寻?不言而喻,只能在襄阳附近:

魏晋南北朝士宦遗著这样记述:

东晋人王隐《蜀记》载:“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阡,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刘弘时为荆州刺史。据王隐《晋书·李密传》言,晋惠帝司马衷永兴元年(304年)“兴在弘府”。故李兴偕刘弘去隆中诸葛亮故宅,亦应在永兴元年,距234年诸葛亮死,仅隔71年。

(注:犍为,地名,古为夜郎国。西晋益州有犍为郡,郡治武阳,今四川彭山县。见清人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卷十五)·犍为郡,王隐《晋书·习凿齿传》收习凿齿《与桓秘书》云:“去年五月三日来达襄阳,……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

南朝人鲍至《南雍州记》记述:“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南朝人盛弘之《荆州记》记述:“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有孔明宅。”

北朝人酈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记述更为详细:“沔水又东经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此事。’即此宅也。”酈道元死于北魏孝明帝元诰孝昌三年(527年),距诸葛亮死相隔294年。

正史认定: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五:“初,琅邪郡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南宋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刘备居蜀》:“琅邪郡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清人吴乘权《纲鉴易知录》卷二十六:“蜀:‘冬十月,刘备见诸葛亮于隆中。’目:‘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

著名历史地理文献、方輿、方志记载:北宋人乐史《太平环宇记》(卷145)·山南东道·襄州》载:“诸葛亮宅‘……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即此地(指隆中)也。”南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京西南路·襄阳府·孔明宅》:“在襄阳县西十五里隆村,又有澗水台,在室之西。”(《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八卷《襄阳府·襄阳县·隆中山》载:“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书院,汉诸葛亮所居宅,西有澗水台,昭烈三顾亮于草庐,有三顾门。”

故居在何地?所列史书记载认定,在襄阳县城西隆中。无只言片语在宛城西卧龙岗。

在襄阳西就属襄阳县吗?说属襄阳县,也对也不对。说对,是从北周时起到现在,隆中都属襄阳县,清初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九)·湖广五·襄阳府》:“刘宋大明末(464年)割襄阳西界为实,尚邓县属焉;齐因之。……后周时邓城县度。”此后复县,改名,皆不辖沔水南;说不对,是汉魏时,特别是在诸葛亮活着时,隆中不属襄阳县,属汉魏南阳郡邓县管辖。

三、隆中、邓县、南阳郡考

东晋襄阳人习凿齿《襄阳记》曰:“亮家于南阳之邓

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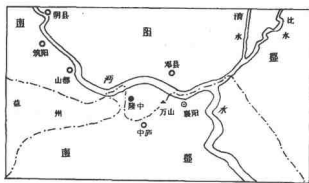
唐人李善注南朝人萧统《文选》(三十七卷)·诸葛亮孔明出师表引《荆州图副》：“邓城旧县西南一里许，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南宋人祝穆《宋本方輿胜览·京西路·襄阳府·独乐山》：“在邓县西七里，诸葛亮尝登于此，作梁父吟。”

古籍文献记载，诸葛亮生前隆中属邓县，邓县与襄阳相邻接壤，边界在哪里呢？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二》：“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按《襄阳记》载，翻过万山向西，便进入邓县地界(万山实一自然界碑)；再往西走七里，即是邓县隆中，隆中山以西，属东汉南阳郡中庐县管辖；三国曹魏时，属襄阳郡山都县管辖。

对邓县伸向河南部分的边界，谭其骧教授曾作图标示。现临摹摄取如下：

图一、东汉邓县西南边界：



图二、三国魏邓县西南边界：



(均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荆州刺史部》，《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魏·荆州》。)

需区别：故居隆中所处的邓县，与现在南阳市南的邓州市，不是一个地方。现在的邓州市，在三国灭亡前，

一不叫邓州，三不叫邓县，三不叫邓城；叫“穰”。

穰，“春秋时邓侯国。战国时属楚”《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六》；后属韩，苏秦说韩宣惠王(前332—前314年)：“韩西有宜阳，长阪，东有宛、穰、洧水”《战国策·韩策一》；又归秦，“……秦武王(约前310年后)攻取之，封魏冉为穰侯”《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二》卷二十一(史始称“穰”)；“秦昭王三十六年(前271年)，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史记·秦本纪》。“秦为穰邑，属南阳郡”《大明一统志·南阳府》。“汉以为县，属南阳郡”《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二》。三国因之。直到隋开皇七年(587年)，于穰县置邓州，才有邓州名字至今日。(注：邓侯国，即故居所在的古邓县地。春秋时曾管辖到今邓州市——属古邓国属地。国都在邓县城附近古邓国故城，今襄樊市樊城北。)

汉魏时，隆中属邓县，历史沿革，秦、汉、三国魏，邓县属南阳郡，是西周邓侯国封地。

春秋被楚灭亡，成为楚邑，“十六年(前678年)，楚复伐邓，灭之”《左传·庄公七年(前687年)》；南朝人沈约《宋书·州郡志》载：“故邓侯，吾国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县。”战国归秦，“(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邓，赦罪人迁之”《史记·秦本纪》；又：秦昭王封公子悝为邓侯。秦、汉、三国魏为南阳郡。元朝人胡三省《通鉴地理注》云：“汉南阳之邓县。”《汉书·地理志》说：“邓，故国，都尉治。”(注：都尉治，郡武官都尉治所，相当于郡武装力量司令——郡军事领导机关。)三国“魏黄初二年(前219年)，追封曹冲为邓侯”《二十五史补编》三册(清人吴增谨、杨守敬撰补)《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北周邓县废，唐恢复，《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五·襄阳府》：“贞元末(805年)，移临汉县治古邓城，遂为邓城县，属襄州。”邓县城在“洧水右合沔水，俗称弱沟”《水经注(卷三十一)·洧水》。“故邓城在县东北二十二里，春秋邓国也”《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今襄樊市江北余岗乡有邓城村(《襄樊市志》)。

邓县旁有一“邓塞”。“邓塞故城在县(邓县)东南二十二里，南临宛水阻一小山，号曰邓塞”《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府》。

南阳郡，“禹贡豫州之域。春秋为申伯及邓侯地。战国为秦、楚、韩三国之疆。秦并其地为南阳郡。两汉因之。曹魏置荆州于此”《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河南六·南阳府》。清人许鸿盘，毕一生精力撰《方輿考证一百卷》卷三十一·《南阳府》：“禹贡豫州之域。春秋为申、邓二国之地。战国分属楚、韩、秦。秦置南阳郡，汉

南阳郡治宛。曹魏治荆州。“秦、汉、三国魏行政区划,邓县属南阳郡。秦统一后,南阳郡领十三县,郡治宛县城:宛县、邓县、胡阳、山都、筑阳、郢县、穰县、丹水、析县、鄢县、阳城、叶县、婁县。见《史记》、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山东南部诸郡。

西汉,南阳郡领三十六县、邑、道、侯国(县级行政区名。侯国,县级封地)。郡治宛县城:宛、穰、邓、山都、新野、犍杜衍、郢、育阳、博山、涅阳、阴、堵阳、蔡阳、筑阳、棘阳、武当、舞阴、西鄂、郾、安众、冠军、比阳、平氏、随、叶、朝阳、鲁阳、春陵、新都、湖阳、红阳、乐成、博望、复阳、雉。见《汉书·地理志》(未按引书顺序排列)。

东汉,南阳郡领三十七县、邑、道、侯国,郡治宛县城:宛、邓、穰、山都、新野、冠军、叶、章陵、西鄂、雉、鲁阳、犍、堵阳、博望、舞阴、比阳、棘阳、湖阳、随、清阳、涅阳、阴、郢、鄢、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见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未按引书顺序排列)。

从建安十三年起,三国魏,南阳郡领二十七县、邑、道、侯国,郡治宛县城:宛、邓、穰、新野、冠军、西鄂、雉、鲁阳、犍、堵阳、博望、舞阴、比阳、棘阳、湖阳、随、清阳、涅阳、鄢、朝阳、蔡阳、安众、安昌、平氏、平林、义阳、叶。从南阳郡中分出山都县归新置襄阳郡,郡治襄阳县城;分筑阳、阴、郢、武当、丹、析、南乡、顺阳八县归新置南乡郡,郡治南乡县城。见清人钱仪吉《三国会要》(卷三十六)·舆地三》(未按引书顺序排列)。

襄阳郡、南乡郡、南郡从何说起?

四、襄阳郡、南郡、荆州辨

襄阳郡,禹贡荆、豫二州之域。西周谷、邓、鄢、庐、罗、郢之地。春秋战国属楚地。“秦为南郡、南阳郡两郡之地。两汉因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平荆州,分南郡编以北及南阳(郡)之山都。立襄阳郡”《宋书·州郡志》。治襄阳郡,都尉治宜城,领八县:襄阳、中庐、宜城、郢、临沮、旌阳、郢、山都。见《三国会要·舆地三》。三国魏因之。襄阳县,“(西)汉始置襄阳县,隶属南郡。县治江北即樊城也”《天顺襄阳府志》卷第一。“新莽为相(阳),东汉复旧。建安中置襄阳郡,郡治襄阳县(城)”《大明一统志》(卷六十)·襄阳府》。三国魏因之。

南郡,春秋楚国地。战国“(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史记·秦本纪》。“郢城在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即吴公子光伐楚,

楚平王筑都之地”(清人孙星衍《货南阁丛书》辑唐人李泰《括地志》)。秦统一后,领八县,郡治江陵。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以南诸郡》。汉武帝时,属荆州刺史部,领十八县、邑、道、侯国,郡治江陵。见《汉书·地理志》。“楚熊渠立长子康为句章王,今江陵也”《史记·楚世家》。东汉领十七县、邑、道、侯国,郡治江陵。见《续汉书·郡国志》。从东汉末建安十三年到三国魏亡,南郡属吴荆州,从略。

荆州,与故居研究有关的南阳郡、南郡、襄阳郡,皆属荆州。考故居,不能不知道荆州。什么是“州”?古称“水中可居曰州。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说文·川部》。

清人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沿革图》提供:《禹贡九州图》绘夏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殷九州图》绘商九州为:冀、兖、幽、营、徐、扬、荆、豫、雍;《职方周制图》绘周九州为:扬、荆、豫、青、兖、雍、冀、幽、并。以上九州,在古籍《古文》尚书·夏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中均有记载。

夏、商、周九州,包括秦,是自然分区,纯地理概念,叫州中有国。西汉以前三代九州为基,将九州中的雍改凉,梁改益;又北置朔方部,南置交趾部、中央置司隶部,合为十四州部。见《汉书·地理志》、《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图说》。东汉朔方并并州,改交趾为交州,合为十三州部。见《续汉书·郡国志》、《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图说》。三国魏复置雍州,蜀置益州,吴置广州,魏、吴分治荆、扬二州,司隶部改称司州,计十八州。见《三国会要·舆地》、《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图说》。两汉三国的州,是行政区概念,叫国中有州。州的行政长官叫刺史,又改牧,后刺史、牧交替,并存,州武官称都督。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三国会要·职官》。西汉初,州刺史的职能是督察区域内郡、国一郡守(后叫太守)、郡尉(后叫都尉)、相(国首长)等官吏的行为;后行使行政权,实际上州部,成为郡、国的领导机关;刺史、牧成为行政长官。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三国会要·职官》。西汉州治无定所,东汉始有,三国因之。三国亡前,州名与郡、国名及州、郡、国治名,无一例同,两汉三国,有州无州城,即没有州名命名的城,州只是个行政区。

《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说诸葛亮“随叔父避难荆州”。荆州什么地方?不得而知。缺少这点历史知识,还以为去“荆州城”避难呢。明朝人诸葛亮后裔诸葛亮《诸葛亮孔明全集》(卷一)年谱提到“后主生于荆

州”。荆州这么大，生于荆州什么地方？是个谜，说不清。原因是对荆州知道的甚少。现已清楚，荆州乃古夷贡荆州之域。春秋为楚地。战国属楚韩，后秦拔郢置南郡。见《史记·秦本纪》、《湖广图经志书》卷一、卷六。秦置郡未置州。西汉置荆州刺史部，领七郡：国、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国、桂阳郡、武陵郡、零陵郡。见《汉书·地理志》。东汉领七郡：国、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桂阳郡、武陵郡、零陵郡、长沙国。州治先汉寿，后襄阳，见《续汉书·郡国志》。建安十三年到三国亡，魏荆州领七郡：南阳郡、南乡郡、襄阳郡、江夏郡、新城郡、上庸郡、魏兴郡。“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十月，荆州部……七郡；治汉寿，刘表徙治襄阳”（《清人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荆州州治在襄阳，刘表主政在襄阳，所以诸葛亮投奔刘表到荆州避难，也只有在襄阳或襄阳县城附近。

建安六年（201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在新野屯驻，新野时归荆州南阳郡管辖。刘备是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冬去隆中三顾的；恰甘夫人也在此年生后主，所以以后主是生于荆州的新野县；新野城内有遗迹太子阁，文革前拆毁，建成了粮店，原阁建在大仓院内。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大军南下，刘备才携城内军民、家眷“起新野、奔樊城、败当阳、走夏口”，且有当阳长坂坡“赵云救阿斗”一说。

行文至此，按说故居已经查到，在汉魏荆州南阳郡邓县隆中；但问题远未结束，对故居传统说持疑义的同志，仍存在着原则性分歧意见，有三种说法，有待深入考究，找出有力的证据，说出令人信服的道理。

五、“三说”评议

1. “南阳宛县”说。

认为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指的是汉魏时的宛县；“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指的是今南阳市西郊卧龙岗。

汉魏时，南阳二字只指南阳郡，不指宛县，宛县不称南阳。且郡、国名与郡、国治名，异的多，同的少。但同则同、异则异，从来丁是丁、卯是卯，泾渭分明不混淆。

就荆州而言。西汉七郡：南阳郡治宛，南郡治江陵，江夏郡治西陵，长沙国治临湘，桂阳郡治郴县，零陵郡治零陵，武陵郡治武陵。仅一郡，郡名与治名同。

东汉七郡：除零陵郡治由零陵改泉陵外，其他六郡同西汉，郡名与治名全异。三国魏七郡：南阳郡治宛，南

乡郡治南阳，襄阳郡治襄阳，上庸郡治上庸，魏兴郡治西城，新城郡治房陵，江夏郡先治上昃城后治石阳，三郡名与治同。以上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三国会要·舆地》、《中国历史地图集》。

荆州在两汉、三国魏（吴荆州省略不叙）时期，共置二十一郡、国，仅四郡，郡名与郡治名同，其他皆异。隋以前，南阳郡名与郡治宛名，一直是分开的，互不替代。

故诸葛亮自撰“躬耕于南阳”，说的是南阳郡，不是宛县；更不是宛县城西、元时的卧龙岗武侯庙了（前已提及）。

汉魏籍贯、寓居地习惯称谓特点：郡名：两字郡名，一般不带“郡”字，一字郡名例外，如：南郡、巴郡。郡、县名：可连接称谓，也可单称郡名，绝少单称治名或县名。

《后汉书》班固为南阳郡人立传五十二，皆如此，例：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人（南阳郡宛县人）；张衡，字子平，南阳西鄂人也（南阳郡西鄂县人）；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南阳郡新野县人也）。遗存、出土汉石刻碑铭，与史书记载格式同：东汉《嵩山少室石阙》铭石刻：“……零陵泉陵薛政……”（零陵郡泉陵县薛政）；今曲阜孔庙立《礼器碑》：“……南阳宛……南阳平氏……汉中郑……”（南阳郡宛县，南阳郡平氏县，汉中郡南郑县）；清乾隆年间出土，现存南阳市西南卧龙岗汉碑亭内的《李孟初神祠碑》首句：“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字孟初，神祠之碑……”永兴二年六月。（“译为：曾任过益州刺史的原宛县县令、南郡襄阳县人李孟初的神碑”。（注：永兴二年，即东汉桓帝刘志年号，154年）。立碑人把州、郡、县、职官、籍贯、简历，在一句话里，表达得多么清楚；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3年），李孟初死后20年诸葛亮生，从李墓碑行文看出，当时宛县不称南阳县；所以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也不是指宛县。见《汉碑集释》。

中国古代，就行政区而言，县比郡早，郡比州早。

说起宛县的名字，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县。

西周属“故申伯国”《汉书·地理志》。春秋属楚，置宛县，“楚文王伐申”《左传·庄公六年（前688年）》，西晋人杜预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楚惠王十一年（前478年），子谷（回忆）说惠王：“彭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注：令尹，早期县长官）见《左传·哀公十七年》。战国先属楚后属秦，秦治南阳郡后，宛为郡治。秦、汉、三国魏，均为南阳郡治。“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括地志》，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宛在申城南。”（今南阳市北）。

魏时曾为荆州治。从楚文王二年（前688年）灭申

国置宛县,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郡、废宛、改宛为南阳县属邓州的1207年间,宛县名字未变。只表示县名和郡、县治名,不表示郡名。从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置南阳郡,到隋开皇三年的855年间,“南阳”二字,是郡的专用地名。宛县的名字要比南阳郡的名字早417年。

故诸葛亮不会把宛县称作南阳。

2. “水北为阳”说。

对南阳、襄阳的“阳”与故居争论有关,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

古人古籍,对“阳”的方位诠释约有四种:李善注东晋人郭璞《上林赋》注云:“在南曰阳”;清人郝懿行《尔雅义疏》引唐人贾公彦疏《周礼·秋官司寇·作氏》云:“山南曰阳。”(此《尔雅·释山》旧说);唐人孔颖达疏《毛诗·大雅·大明》云:“水北曰阳”;《玉篇》阜部云:“阳,山南水北也”。南阳属第四种诠释。

对南阳,又有三种具体解释:东汉人张衡《南都赋》有“陪京之南,居汉之阳”佳句。李善注《文选·南都赋》:“京为洛阳,背向洛阳。”《晋书·潘岳》亦作“背京”讲。陪背讲。陪京不是指东汉宛县(现南阳市)。《读史方輿记要》上海版:“南阳郡治于宛,在嵩山南,汉水北也。”《通鉴地理志》云:“秦之南阳郡,以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

三种解释大同小异,共同认为:南阳郡是一个北到嵩山之阳,南到汉水的一个广阔地带,而不是一个宛县。

襄阳和南阳不一样,它建在沔水之南,不符合“水北为阳”说;但符合“在南曰阳”说。中国古代,带“阳”的城邑建在水南的不在少数,如:汉阳、安阳、当阳、阜阳、邵阳、益阳,等等。

“襄阳”的“襄”,出《古文》尚书·夏书·尧典“荡荡怀山襄陵”,荡,孔颖达《尚书正义》“言水势突奔”;怀,西汉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曰“包”;襄,《尔雅·释言》“襄为架,驾乘牛马皆在上也”;《孔传》也说“襄,上也”;《文选·西京赋》注引薛综语“襄为高也”;陵。《尔雅·释地》云“大阜曰陵”,又“高平曰陆,大陆曰阜”。故“荡荡怀山襄陵”可译为:包容在山上的洪水,居高临下,奔流到大片平坦的高地。《天壤襄阳郡志》卷第一说:“水驾山而下为襄。”沔水从西北来,驾秦巴山地,突流而下,直奔襄阳,急转东南,进入江汉平原,这个由山地到平原、急转弯的特殊地理位置为“襄”;又在沔水之南,所以叫襄阳。

汉魏时,襄阳城南有一小溪叫“襄水”,《方輿考证

一百卷(卷五十九)·湖北三》云:“淠水,出南漳,北东流至宜城界入汉,一名襄水。”《水经注·沔水》卷二十八载:“淠水自(鸭)湖分,……北渠为檀溪水,……北注沔;一水东南出,应邵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符合“水北为阳”说。但襄水太小,《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引陆澄《地理志》曰:“襄阳无襄水。”所以应以“在南曰阳”为妥。

前文提到的西晋刺史刘弘与太傅掾李兴去故居,为诸葛亮立庙,文中的“天子命我,于沔水之阳”,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认为,故居在沔水北边;另一种认为,刘弘在沔水北边打仗。其实,都不够准确,应否理解为:在沔水以南的隆中、有诸葛亮旧宅?符合“在南曰阳”说。

3. “沔水为界”说

南阳说认为,汉魏南阳郡与南郡以沔水为界,西北为南阳郡,西南为南郡。这种说法有历史根据,前文提到的张衡、顾祖禹、胡三省这些历史大家,也持“沔水为界”说。但这只是个宏观地理概念,不确切。正像张、顾、胡说南阳郡的北界在“洛阳”、“嵩山”、“南山”一样,实际北界在方城山、叶县一带,离上述相距甚远;南界名为沔水,这只是个大的方位;实际是在沔水两岸大牙交错,西南有南阳郡大片土地。见前图。

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后汉书》纪、传记载,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看出:秦时,南阳郡有山都、筑阳、鄧县三县境域跨沔水,向沔西南延伸约30—50公里。西汉时,南阳郡有山都、筑阳、鄧国、阴县、武当五县境域跨沔水,向沔西延伸约35—50公里。东汉时,南阳郡有山都、筑阳、鄧、阴、武当、鄧县六县境域超沔水,向沔西南延伸约35—50公里。建安十三年到三国魏亡,原南阳郡筑阳、鄧、阴、武当划归南乡郡;山都划归襄阳郡。但南阳郡的鄧县境域,仍越沔水,向沔南延伸约15公里,直达襄阳郡中庐地界,东到襄阳县城西万山,西到隆中包括隆中。

上述事实,能说南阳郡、南郡以“沔水为界”吗?非耶。所以“襄阳地分隶二郡(南郡、南阳郡)之鄧”《天壤襄阳郡志》卷第一,非以“沔水为界”。

还有一种说法是不坚持“沔水为界”,但坚持山都、襄阳段“沔水为界”。沔水山都襄阳段约40公里,沔水经山都东南流约10公里,两岸全是山都地界;又东北流约五公里,再东南流进入鄧县境域约10公里,两岸是鄧县地界。起码沔水山都、鄧县段南岸有约二十公里长的土地归南阳郡所有。当然建安十三年山都划归襄阳后例外;即便如此,鄧县西南,还有南阳郡的土地,此说

不能成立。

既然两部不是以“沔水为界”，那么位于沔南的隆中故居，属南阳郡邓县是存在的。

六、要有良好的争鸣气氛

有人批评持疑义的古人是“附会”，今人是“争名人”，此话欠妥。

故居在哪里？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会引起一场广泛而长久的争论，恐怕主要在于陈寿的疏忽。

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四次直接、间接提到诸葛亮的寓居地：一次，“玄卒，亮躬耕陇亩”（有田野，无州、郡、县、乡）；二次，“玄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有州，无郡、县、乡）；三次，引诸葛亮语，“躬耕于南阳，……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有郡、家，无县、乡）；四次，“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有州、野，无郡、县）。每次都没说清。

陈寿生，诸葛亮未死。作为蜀人，作为谯周弟子，作为史官，作为晋帝诏令，为诸葛亮作传，竟不负责任到这种地步：记载残缺不全，含混不清，似是而非，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认真，求实、严肃、严谨，是史官治史应有的基本态度，他好像不全具备。当然，这里仅指他对故居介绍疏漏而已。比陈寿晚的《后汉书》作者范曄则

不然，他叙述人物生平籍贯，完整、分明、准确、翔实、一目了然。《后汉书》与《三国志》相同的立传人物，范曄在修撰时对不足缺漏、错谬之处，都作了弥补纠正。

由于陈寿的疏漏，留下一个个疑团，困扰着后人；并诱发了一场场争论。争论是正常的；有疑必争，无疑争什么？但不能把不同认识、不同观点，简单地说是“附会”、“争名人”。学术争论，无可责怪。

1996年5月10日《光明日报》短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在京举行“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会上专家认为：“襄阳隆中是遗迹性名胜，南阳武侯祠是纪念性名胜。”此乃高见。

通过争论，是非明晰，疑义获释，悬案了结，获益匪浅。现在，对故居，汉魏时在南阳郡邓县隆中——今襄阳县城西隆中的传统说法，已基本趋向共识。当然，决非不存异议！存在异议，也属学术争论的正常现象。

今南阳市卧龙岗虽不是诸葛亮故居，但它和全国其他九处武侯祠庙一样，不失为后人对一代贤相的敬仰和纪念，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笔者是今南阳新野人，对此争论十分关注，今借用复旦大学彭保生先生在一篇讨论文章末尾和顾嘉衡先生的对联：“研究躬耕地应该辨明真伪；纪念诸葛亮不分襄阳南阳。”权作本文结尾。

（责任编辑 冯 蓉）

（上接第87页）

原则在当代的国民素质教育中仍有其合理性成份，是我们的精神财富。而当代社会所追求的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目标，则更多地着眼于提高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这不仅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又是逐步实现马克思指出的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过渡环节，这种更高层次的人的觉醒，正是梁启超和五四先驱者们梦寐以求而又无法实现的理想。

参 考 文 献

- 1 《美》马文·佩理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158
-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512
- 3,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8, 20, 21, 22, 23, 24, 25, 28, 29,

- 30, 31, 32, 33, 34 吴嘉勳、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6, 207, 133, 209, 210, 206, 117, 167, 171, 726, 212, 740, 210, 218—220, 652, 190, 128—129, 216, 211
- 5 吴廷嘉著，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5
- 15 张枏、王恩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4, 120
- 16 20 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1, 1, 212
- 17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 423
- 26 姜义华，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新华文摘，1997, 9, 65
- 35 陈独秀，独秀文存·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87—88
- 36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

（责任编辑 司国安）